

南唐贡举考略

周腊生

有关五代时期周边各国的科举考试情形,向来无人作专门的研究。

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选举考》于宋代科举考证较详,于唐五代则甚为粗略,更未注意十国的贡举情形。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对唐五代科举考试情形的考证用力颇深,弥补了《文献通考》之不足。但仍未涉及十国的贡举情形。其实,吴、南唐、前蜀、后蜀、南汉等国都曾非止一次地举行过科举考试。尤其是南唐,自后晋天福二年(937)建国,至宋太祖开宝八年(975)灭亡,前后存续了39年,见于载籍的开科次数尤多。其具体情形,是应加以研究的。兹略呈翻检所得,以求教高明。

一、首开贡举于升元末(942)

关于南唐贡举,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十六载,宋太祖开宝八年二月“江南知贡举、户部员外郎伍乔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。自保大十年开贡举,讫于是岁,凡十七榜,放进士及第者九十三人,九经一人。”所谓“江南”,即南唐;“保大十年”即后周广顺二年(952)。《宋史·太祖纪》、《十国春秋》卷十六及《续资治通鉴》卷八等皆有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载。元·陆友仁《砚北杂志》卷上亦云:“五代僭伪诸国,独江南文物为盛。然每岁科举,取人甚少,多用上书言事拜

官，唯广顺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贡举，放进士庐陵王克正等三人而已。”

这些记载相互印证，基本上是可信的，但谓保大十年（即后周广顺二年）为南唐首开贡举之年，则不确。南唐贡举首开于升元末年。

《十国春秋》卷二六云：“李征古，袁州宜春人，升元末，举进士第。”“升元”（937—942）为南唐立国者李昇的年号。“升元末”当指升元六年（942），因为七年二月李昇去世，三月即改元保大。

升元末之前有无贡举？有。但没有进士举。同书卷二八《徐锴传》提到：“升元中，议者以文人浮薄，多用经义、法律取士，锴耻之，杜门不求仕进。”升元共6年，除末年有进士举外，其余5年虽亦开科取士，却只有经义、法律等科，以致长于文学的徐锴“耻之”而不肯就试求仕进。

同卷《郭昭庆传》又云：“郭昭庆，禾川人。父鹏，保大初进士，官至大理司直。”《马氏南唐书》卷十四也有相同的记载。很显然，保大初亦开过贡举。保大初当指保大元年（943）。

为什么升元末、保大初均有进士举，而前引记载却都认为南唐贡举自保大十年始呢？笔者以为：升元年间大部分时间虽开贡举，而未开自唐以来文士趋鹜的进士科；保大初考过一次后又经过了长时间的停顿；人们习惯于唐及五代中原5朝那种年年开考的做法，中断太久，便将先前的偶尔两次开科忽略不计了。

二、自保大十年始可落实开考年份的10次

（1）保大十年（952），开考1次：

《陆氏南唐书·纪二》载：“保大十年……二月……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，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。旋复停贡举。”《十国春秋》卷十六所载略同，前引《砚北杂志》亦有相同内容（惟将状元写成“王克正”），此次开考属实。

为什么考了一次又停呢？《陆氏南唐书·江文蔚传》称：“升元建国以来，言事遇合，即随材进用，不复设礼部贡举。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学士知举，略用唐故事，放进士庐陵王克贞等三人及第。元宗问文蔚：‘卿知举取士，孰与北朝？’文蔚曰：‘北朝公荐、私谒参半，臣一以至公取才。’元宗嘉叹。中书舍人张纬，后唐应顺中^①及第，大衔其言，执政又皆不由科第进，相与排沮，贡举遂复罢。”可见，“旋复停贡举”是因为江文蔚得罪了当权者。

(2)保大十二年(954)二月，开考1次：

《十国春秋》卷十六载：“十二年……二月……命吏部侍郎朱巩知贡举。”《陆氏南唐书·纪二》也有这次考试的记载。由此可见，所谓“停贡举”，也只停了1年。因为自唐至宋太宗初年一般都是每年开考，有1年不考也算“停”。

(3)保大十三年(955)，开考1次：

[嘉靖]《池州府志》卷七载：“南唐：伍乔：保大十三年状元。”《十国春秋》卷三一《伍乔传》载：伍乔“……使入金陵应进士举。及试《画八卦赋》、《霁后望钟山诗》。故事，中选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。时有宋贞观者，首就座。张洎续至，主司贤洎文，揖贞观南坐，引洎坐于西。酒数行，乔始上卷。主司叹为杰作，乃徙贞观处席北，洎处席南，而以乔居宾席。无何，复考榜出，乔得第一，洎、贞观次之。时称主司精衡鉴焉。元宗大爱乔文，命勒石，以为永式。仕至考功员外郎，卒。有集一卷，行世。”

这次主考是谁，未明指，但这段记载也提供了如下信息：共录取3人；试题为《画八卦赋》和《霁后望钟山诗》；要经过复试确定名次；主司要请初选被录取者宴饮，且以文章质量高下排座次。

自保大十三年冬始，后周发兵大举进攻南唐。战争持续了两年多，至交泰元年(958)，南唐臣服于后周：割让江北光、寿、庐、舒、蕲、黄等14州给后周；每年向后周进贡；去帝号，称国主；采用后周年号；李璟为避周信祖讳而改名景(见《陆氏南唐书·纪二》)。估计

保大十四、十五年及交泰元年不会开贡举。

(4)宋建隆三年(962),后主继位后的首次贡举:

《十国春秋》卷二五载:“乔匡舜字亚元。……后主嗣位,复起为司农少卿,历侍中、监修国史、给事中,兼献纳使。知贡举,放及第乐史辈五人,多见滞名场者,时称得人;而少年轻薄子嘲之,谓之‘陈橘皮榜’。”《陆氏南唐书·乔匡舜传》所载略同。《十国春秋》卷一一五《乐史传》、《玉芝堂谈荟》卷二亦皆云乐史为南唐进士第一。另,《十国春秋》卷一一六载:“南唐给事中乔匡舜知举,进士及第者五人,即丘旭、乐史、王则、程渥、陈皋也。该举数升降,等甲无名。时以为乔之榜类陈橘皮,年高者居上。”这里将丘旭排于首位,乃因“等甲无名”,即无等第名次,而“年高者居上”。《马氏南唐书·丘旭传》云:本科考的是《厚德载物赋》,并指出丘旭为“第一人”,大概是受了类似上则记载的影响,显然有误,同一科不可能有两个状元,状元应为乐史;联系该传中所载丘旭回答吕蒙正问话时所说“江南献赋适为第一”等语,或是考赋那场他确实得过第一,而总名次并非第一。

宋取代后周之后,南唐又臣服于宋,用宋朝年号。元宗于宋建隆二年(961)六月去世,后主随即嗣位。依惯例,后主朝首次贡举当在本年(962)二月或三月。

(5)乾德元年(963),开考1次(见下):

(6)乾德二年(964)三月,开考1次:

《陆氏南唐书·纪三》云:“乾德二年春三月……命吏部侍郎、修国史韩熙载知贡举,放进士王崇古等九人。国主命中书舍人徐铉复试舒雅等五人,雅等不就。国主乃自命诗赋题,以中书官莅其事,五人皆见黜。”

《十国春秋》卷十七有相同记载。同书卷二六《冯延鲁传》又云:“子僎,韩熙载知贡举,放及第,复试被黜。”当为本科之事。同书卷三二则曰:“冯延鲁子僎举进士……明年,僎成名……未数日,中书

奏主司取士不当，遂追榜御试，僎果复落。”可见，上年也曾开考，冯僎应试而未中。

《重修安徽通志》卷四五说舒雅为南唐状元、《马氏南唐书》卷二二《舒雅传》所云：“会熙载知举，以雅为第一，朝野无间者，以雅之才为当也。”皆不确。

(7)开宝元年(968)，开考1次：

郑文宝《江南余载》卷上云：“开宝初，举子齐愈及第，缀行至白门，忽于马上大笑不止，遂坠。馭者扶策，良久乃苏。盖其喜成名如此。”所谓“开宝初”，当指开宝元年(968)；“白门”乃南唐都城建康(今江苏南京市)的正南门，即宣阳门。很显然，齐愈为南唐该科进士，由于每次取人都很少，他才喜极失态。

(8)开宝五年(972)二月，开考1次：

“开宝五年春二月……内史舍人张昺知礼部贡举，放进士杨遂等三人，清辉殿学士张洎言昺多遗才，国主命洎考复不中第者，于是又放王纶等五人。”(《陆氏南唐书·纪三》)

《十国春秋》卷十七所载基本相同，然“王纶”作“王伦”。同书卷一一五云：“南唐张昺知贡举，试《天鸡弄和风赋》，昺但以《文选》中选句为题，未尝详究也。”

(9)开宝六年(973)开考1次：

《十国春秋》卷三十《张昺传》曰：“张昺，常州人。后主朝仕为考功员外郎，进中书舍人。开宝五年，贬损制度，改内史舍人。后主雅好文事，虽当末运，犹留意于科举，以昺有文，使知礼部贡举。揭榜之前夕，有程员者，梦人报已与王纶等五人及第，员惊喜，谒省门，遇杨遂、张观、曾凯，谓曰：‘榜在鸡行街，何忽忽至此？’既寤，则闻遂等三人中选。其夏，后主疑昺颇任私意，命张洎复试，遂再放王纶等五人。乃知洎虽矫昺之弊，然前定固如此。明年癸酉附榜，则‘鸡行’之应也。”所谓“明年癸酉附榜”，显然指开宝六年(973)，即癸酉年也开过贡举，且有“附榜”，程员于“附榜”中选。这段记载对开宝

五年的考试情形作了如下补充：复试于夏天举行，首次所取的是杨遂、张观、曾凯三人。

(10)开宝八年(975)二月，最后一次开贡举：

关于这次考试，前文已有引述，惟《陆氏南唐书·纪三》所载略有不同：“乙亥岁春二月壬戌，王师拔金陵……长围既合，内外隔绝……群臣皆知国亡在旦暮，而张洎犹谓北师已老，将自遁去，后主益甘其言，晏然自安，命户部员外郎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及第。”此言状元为“孙确”，该科进士共38人，均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记载不合，当以《续长编》等为准。

三、保大十年后仅能大致推定年份的4次

(1)卢郢夺魁于乾德中：

《马氏南唐书》卷二三载：“卢郢，金陵人也，好学有才艺，而膂力过人，善吹铁笛。乾德中，后主以韩德霸为京城烽火使，常督无赖辈旦暮巡警。诸科士人微犯禁，往往罹鞭扑。会德霸出，郢调笛不辍，使数卒捕郢。郢奋胳膊之，卒不能逼郢，遂去。后与黄梦锡等自国子学出行，遇德霸，不避其呵导，德霸驻骑诟曰：‘汝等乞索辈，殊不知宪制，敢无礼耶？’因斥左右收郢等。郢等争投瓦石，击走其导从，殴德霸，伤目。德霸诣后主诉之。后主让曰：‘国子监，先帝教育贤才之地，孤亦赖此辈与之共治，汝斗监前，是必越分凌辱士人；既为戎帅，不能自捍，宜其见殴。’遂罢德霸职。郢由是横肆益甚。明年，春试《王度如金玉赋》，郢唱第为第一。”又云“徐铉娶郢妹。铉受后主旨撰文。数日不能就，因语郢。郢曰：‘愿试为之。’因弄百钧石毬以较力，少顷引酒一卮，复弄石如初。若是者数四。铉视之，曰：‘非吾徒也，其何能为？’且试诘之。郢曰：‘既就矣。’命笔吏口授而书之。铉大惊。遂以郢文进。后主谓铉曰：‘语势遒劲，似非卿作。’铉以实对，郢由是知名。归皇朝，累迁南全守，颇著治绩，病卒。”

《陆氏南唐书·传十二》、《十国春秋》卷二八所载大抵相同。文

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江南通志》卷一一九亦云：“南唐：卢郢，江宁人，状元。”可见卢郢确为南唐状元。

但具体夺魁于何年呢？上引记载中提到“乾德中”、“明年，春试”。乾德共五年，而乾德二年状元为王崇古，那么卢郢夺魁之年应在乾德三年(965)或四年。

(2)姚端夺乾德五年(967)状元。

“姚端年十八，状元及第。游简言以女妻之。未几疾终。时人谓之‘女杀状元’。”(《江南余载》卷上)这里既云“游简言以女妻之”，当是游简言(914—969)在世之时。游是名流，地位甚高。据《十国春秋》卷二一及《南唐将相大臣年表》，他在烈祖代吴时已官至翰林学士；元宗立，为礼部侍郎；后主继位，拜吏部尚书，次年为次相，乾德四年升首相，开宝元年又居次相，卒于开宝二年(969)五月。这段记载虽没有指明游选婿时的身份，但既是游简言亲自选婿，那么，姚夺魁最迟是在开宝二年，姑且定他夺魁于游简言为官的鼎盛之年——乾德五年(967)。

(3)邓及约为开宝四年(971)状元。

《马氏南唐书》卷二三载：“(罗)颖初就举金陵，试《销刑鼎赋》、《儒术之本论》，有司以邓及为第一，颖为末缀。榜既上，后主迁颖第二，手笔圈其名。”《十国春秋》卷三一亦载：“罗颖，南昌人，开宝中诣金陵，试《销刑鼎赋》、《儒术之本论》，有司以邓及第一，颖居榜末，既上，后主迁颖第二，手笔圈其名。”这两条记载都透露了一个事实：后主曾亲自过问名次的排定。

按，开宝共8年，“开宝中”，应是开宝四年或五年。开宝五年的状元是杨遂、邓及夺魁大约在开宝四年。

(4)赵绮约为开宝六年(973)状元。

《江南余载》卷上载：“赵绮困于场屋，将自三山北渡以归梁京，为逻者所得，遂下廷尉。从狱中上书曰：‘初至江干，觉干网之难漏；及归棘寺，知狱吏之可尊。’后主览之，批其末曰：‘陵曰孤恩，汉亦

负德。’乃释其罪。明年，绮状元及第。”

赵绮应该考过多次未中，才算“困于场屋”，其夺魁年份，虽未见记载，亦可大致推断：他因屡试不第，遂拟北渡投敌，照常理，当在士子已成离心之势的南唐末期，而开宝五年、八年的状元均已载，七年又可能停举（说见下文），因此，可大略定其夺魁在开宝六年（973）。若再往前几年，后主便难赦其投敌之罪了。

四、其 他

另有几条记载值得注意。

（1）关于知贡举：

《十国春秋》卷二八《徐锴传》云：“徐锴字楚金……与兄铉俱在近侍，时号‘二徐’……锴凡四知贡举，号得人。”《陆氏南唐书·传二》所载相同。然徐锴这“四知贡举”的具体年月诸书均未载。综合前文所叙，江文蔚、朱巩、韩熙载，乔匡舜、张洎、伍乔各任知贡举一次，即可落实知贡举的共10次。唐自开元二十四年始，规定以礼部侍郎任知贡举，他官临时任知贡举，称“权知贡举”。而上述南唐几个已知身份的知贡举分别为：户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、吏部侍郎、给事中兼献纳使、吏部侍郎兼修国史、内使舍人，却偏偏没有礼部侍郎，各种职官任知贡举亦均不带“权”字，说明南唐的礼部已不操选才之权，任命知贡举颇随意。

（2）可能停举的年份：

《江南余载》卷上载：“赵叟者，自保大之初至于开宝之季，尝为贡院门子。每岁放榜之后，或去或取，率庆慰之，若出于叟手然。进士^②何蒙赠叟诗曰：‘桂枝输却正凄然，又被鸛声聒昼眠。唯有赵翁知仔细，相传好语等来年。’”

这段记载有几点信息值得注意：提供了一位南唐进士的姓名；南唐亦有专门的“贡院”，有专人管理；且“每岁放榜”。这“每岁放榜”乃是沿袭唐代旧制，正常情况下年年开考，停考属特殊情况。自

952年至975年，共考17次，中间共停过7年。除前述953年停举，956年、957年、958年可能因战事而停举外，其他可能停举的3年当是宋建隆元年(960)、二年及开宝七年(974)。因为建隆元年北宋代周，政局发生重大变化，建隆二年二月南唐迁都，六月中主李璟去世(见《陆氏南唐书·纪二》)，必定会影响科举之事；开宝六年下半年南唐闹饥荒，紧接着七年又与宋的关系紧张起来(见《十国春秋》卷十七)，也容易造成停举。若这样分析不错，剔除停举与可能停举的年份，则可确定中主朝共考5次：保大元年(943)、保大十年(952)、十二年、十三年，显德六年；后主朝共考13次：建隆三年(962)，乾德元年(963)、二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，开宝元年(968)、二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、六年、八年。

《马氏南唐书·丘旭传》、《十国春秋·丘旭传》都说丘旭“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”。丘旭及第于建隆三年(962)。综上所述，至此年共开进士举7次，于“九举”之说是否矛盾？不矛盾。五代各国跟唐代一样，举子在参加国家考试前，先得通过“乡举”。《马氏南唐书·丘旭传》就有“再就乡举，明年春试”等语。他既多次“曳白”，必定无法通过乡举。乡举跟省试隔年，停省试不一定停乡举，而开省试必须先开乡举，所以乡举的次数往往多于省试的次数。

(3)南唐士风：

上引有关舒雅等拒绝参加复试、程员梦及第、士子称乐史那一榜为“陈橘皮榜”、齐愈喜极失态、赵绮因“久困场屋”竟拟北渡投敌等材料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南唐士风。《江南余载》卷上又云：“国中有称冤者，多立于御桥下，谓之‘拜桥’，甚者操长钉、携巨斧而钉脚。又有阑入于殿廷者，谓之‘拜殿’。后主时进士曾凯、谢泌皆南省下第，而凯钉脚、泌拜殿，以称冤，士风于此扫地。”因考试不中而“钉脚”，“拜殿”称冤，自然有辱士风。跟齐愈的故事一样，至少表明了一些士子功名心太切(这段记载又提供了一位南唐进士的姓名——谢泌；曾凯为开宝五年进士，前文已及)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七又载曰：“先是，池州人樊若水，举进士不中第，上书言事，不报，遂谋北归。先钓鱼采石江上，用小舫载丝绳维于南岸，而疾棹抵北岸，以度江之广狭，凡数十往返得丈尺之数，遂诣阙自言有策可取江南。帝令送学士院试，赐及第，授舒州团练推官。若水启帝，以老母及亲属皆在江南，恐为李煜所害，愿迁至治所。帝即诏国主护送，国主听命。戊辰，诏若水为赞善大夫，且遣使诣荆、湖，如若水之策，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。”“戊辰”乃开宝七年（974）七月戊辰日。这段记载与赵绮也差一点走了北渡投宋之路均表明：南唐之败亡，跟士人离心资敌有直接的关系。而士人离心，乃至资敌，又直接反映了南唐朝政之腐败——用人不当、取士不公，每令怀才者失望。

南唐共开科 19 次，可考知姓名的状元有王克贞、伍乔、王崇古、乐史、杨遂、张确、卢郢、邓及、赵绮、姚端等 10 人，其余 9 人皆湮没无闻，上述 10 人中又仅乐史、伍乔、王克贞较有影响，其余的大多难以查考其生平事迹，正说明南唐政权虽重视科举，却未能通过科举选出真正有作为的人才。

注：

①据《登科记考》卷二五，张纬为后唐同光四年进士，此处“应顺”应为“同光”。

②《宋史》卷二七七有《何蒙传》，明确指出何“举进世不第，从献书言事署官”。此何蒙亦由南唐入宋，或与本文何蒙为同一人。那么，本文此处“进士”一词的实际含义当为“进士科考生”，唐五代载籍中每有这种含糊的用法。本文姑且视为两人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